

“全球南方”国家的绿色 可持续现代化探索

——以拉美为例

韩 晗

摘 要 拉丁美洲国家正面临“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挑战：如何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径。这一挑战涉及理论、政策与实践的多维度问题。尽管拉美较早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其实践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外部理念和实践路径的“水土不服”促使拉美反思本土理念的“现代化”路径。区别于发达国家因环境破坏引发的对后工业时代反思的理念发展路径，拉美以“美好生活”（Buen Vivir）、“帕恰妈妈”（Pachamama）和共同体为代表的印第安人理念，随着知识领域去殖民化理念的浪潮而兴起，丰富了绿色发展的精神内核。这些本土理念在打破殖民中心主义理论偏见、推动本土发展政策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拉美国家探索当代生态文明道路提供了新的方向。然而，拉美的理念和制度实践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的成功经验未来或成为中拉在全球南方框架下发展理念、实践与合作的新机遇与新亮点。

关键词 绿色可持续 现代化 全球南方 印第安传统理念 “美好生活”

[中图分类号] D521; D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51X (2025) 02-0123-13

拉美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并非政治或经济的单一学科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范式。破解发展范式危机，是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前提。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早于发达国家中产生，其形成源于对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过度工业化带来环境污染的发展模式反思。以环境为代价导致这些国家面临先污染后治理的问题。拉美虽较早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但与发达国家的实践环境与条件相去甚远。发达国家在完成资源掠夺、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已近成熟后开展的绿色转型经验，不仅无法为拉美借鉴，甚至成为拉美发展的理念制约——拉美的工业化进程曾因发展模式的转变而几近停滞。外部理念和实践路径的“水土不服”，开启了拉美对本土理念“现代化”的求索。21世纪，拉美学界兴起了去殖民主义的进程，政策、实践两方面则深受左翼政治思潮与印第安人社会运动影响。拉美的原住民，在遭受长期被形容为落后、贫困代名词的不公后，发展理念重获制度性关注。当前，地区面临着包括发展目的、路径、政策乃至实践等多方面问题，具化为处理环境破坏与经济发展、政策激励与发展实际低于预期、寻求国家发展路径与印第安人权利保护等多组矛盾。地区国家在探寻发展路径的同时，反思奉西方发展理念为主臬的既有路径，认识到从本土印第安哲学中挖掘绿色发展的反知识殖民主义的重要性，积极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绿色发展理念体系。如何从以环境为代价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绿色、可持续为目标？同时兼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理念与实践？它在打破殖民中心主义理论偏见、本土发展观政策实践中是否发挥了积极效应？拉美国家如何将其纳入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中？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拉美民族问题的新趋势新特点探析》（项目编号：23BMZ166），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创新项目《中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构建高水平全球伙伴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韩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邮编：100007。

一、拉美国家面临的发展范式危机

在世界反思和探索新时代发展新方式的时候，拉美由于欧洲殖民和移民形成的特殊历史、政治和社会原因，反应相对复杂和缓慢。关于拉美地区的发展问题，在《拉丁美洲史》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本地区发展问题的症结在于疏通发展渠道。”（谢里尔·E. 马丁等，2007）土生白人的意识由于其所具有的双面性而带有结构性的不完整。他们一方面渴望融入欧美发达国家世界，这体现在他们追求赴发达国家留学及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广泛地采纳西方理论与体制；另一方面，土生白人又希望获得作为拉美人的独立性，这体现在他们积极参与拉美独立战争及独立后国家建设 200 年的实践中。与欧洲人的同源性使其具有先天的两面性；因而，拉美地区白人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特点就决定了拉美近代以来发展道路的迷茫。

（一）既有发展观为何没能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

拉美在理念上与欧美等曾经的殖民宗主国，有着诸多渊源，又在近 200 年的国家发展进程中，依赖源自西方的理念创造过经济发展奇迹。但是“失去的十年”让拉美陷入长期低增长，第二个更严重的“失去的十年”或让拉美深刻认识到转变发展理念的迫切性^①。

1. 发展目的

拉美国家对依靠外来理念助力地区发展问题进行了反思。源于西方的传统发展理论，主要包含四个分支：二元结构理论、原因理论、改造理论、克服发展障碍理论。西方发展社会学的各种理论流派在一系列重要概念理论和方法论、认识论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不休，至今并无统一的学说。新的发展理论，如：依附理论、满足基本需求理论、国际关系结构理论和数学模型理论等，部分解释了阶段性发展问题，却未能继续引导地区实际发展。同时，拉美国家基于实践的发展理念以及印第安人的发展观，却被排除在西方主导的理论话语体系之外。

狭义经济学把发展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这不仅片面，而且会掩盖一系列因追求狭义发展所带来的恶果。阿玛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的人”，（阿玛蒂亚·森，2002）具体说是现实人的自由发展。此外，他在本书导论中即首先指明：发展的目标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阿玛蒂亚·森，2002）这一观点更关注人类在发展中的真实自由。主张以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的状态为判定发展的价值标准。有位西班牙学者也曾提出：在当今这个世界经济危机日益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时代，危机的各种影响已逐步延伸至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促使人们寻求解决当代发展困境的有效路径。

我国拉美学者曾昭耀在《拉美发展问题论纲——拉美民族 200 年崛起失败原因之研究》一书中指出：

“拉美发展的失败，并不是说拉美没有发展，而是说拉美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困境之中，或像拉美经济学界所判断的那样，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半发展状态’，始终未能实现其发达目标，也就是说，拉美的失败主要表现在独立 200 年拉美现代化‘零成功率’的事实”。（曾昭耀，2002）

拉美各国曾在多场庆祝拉美地区独立 200 周年的活动中，探讨地区的发展：在同邻国美国相比，在仅仅 200 年（1750—1950 年）中，原本处于同一贫困程度起点的拉美与美国，今天在财富水平与社会发展领域却有了天壤之别。

^① 2014 年至 2023 年，人均 GDP 的增长为零，该地区平均增长率 0.8%，不到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失去的十年”增长率（2%）的一半。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反映出不同的历史观、方法论。同其他战后发展中国家一样，拉美地区今天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解析；“后现代主义”“新现代化理论”等，也往往是从西方视角出发，对拉美发展问题并未做到庖丁解牛。相反地，拉美学者通过“中间—外围”关系以及“依附”地位解析地区“资源诅咒”的论述，或是拉美发展问题的真正症结所在。

20 世纪 70 年代，拉美追求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经济和贸易繁荣的自由式发展路径，导致国内的发展理念更为崇洋媚外，发展观的本土化问题进一步被忽视。水土不服的发展观必然带来现实发展问题。

2. 发展模式

现实中，拉美曾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的首个增长奇迹，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陷入债务危机及低增长的“失去的十年”，至今仍在求索发展路径的进程中。

回顾地区历经工业化及去工业化的翻转式发展历程，殖民带来的制度和理念的依附性、国际经贸和社会地位的不公平、过度迷信发达国家的“经验”三个因素，让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陷入被动发展。始于殖民时期的资源出口，让地区国家深受不公平发展制度的掠夺之苦。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地理大发现后，重商主义经济席卷世界，带来了经济全球化，拉美则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化状态。至 19 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高潮时期，拉丁美洲才开启现代化进程。20 世纪墨西哥革命开启了地区革命民族主义，拉美各国受凯恩斯主义和拉美经委会发展主义理论的影响，开启了以进口替代工业化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墨西哥和巴西都曾创造过经济奇迹，拉美的现代化进程一度成为全球发展的典范。在去工业化阶段，由于 70 年代的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主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拉美兴起了经济自由主义之风。至 80 年代末，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拉美大兴反凯恩斯主义“革命”，在芝加哥学派的推动下，“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成为主流，现代化运动由工业化进程变成了非工业进程。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持续伴随地区发展，城市病、中等收入陷阱等成为拉美发展标签。

拉美国家长期以资源开发为主要发展模式，曾经因国际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震荡，在 20 世纪中叶实现了拉美国家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作为最早独立的南方国家地区，拉美国家率先、整体且快速地实现了城市化、现代化。在城市化率、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一度媲美、赶超欧美。20 世纪末期，随着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对外贸易收入下降等因素，拉美一方面在社会发展领域陷入城市病、中等收入陷阱困境中，另一方面，经济发展面临着滞胀等多重危机长期困扰，徘徊不前。

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脆弱的环境间关系问题更为严峻。巴西、厄瓜多尔等国的绿色发展诉求，并非跟随国际发展潮流，而是地区发展的自身诉求，且这一诉求日益迫切。加勒比地区岛国、南美亚马孙地区国家在拥有丰富的海洋及雨林资源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开发和脆弱的环境如何保护的发展路径抉择。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地球上最为脆弱的生态体系，工业经济与资源开发对它们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地区国家更认识到，对上述系统的破坏，结果是不可逆的。在这段发展史中，印第安的传统发展观直至可持续发展理念问世后，才进入发展路径的分析视野。在内外因素下，拉美国家积极探索具有本地区特点的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路径，部分为国际所认可。

（二）生态文明需要因地制宜的理念知识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情的国家，因历史和文化差异间产生了诉求近似、道路多元的发展路径。“美好生活”是拉美印第安人长期历史经验下的可持续发展观，与联合国文件表述有着诸多近似性^①。拉美印第安原住民族群数量过百，居住地区地貌相异，哲学认知却普遍追求关系的和谐，均将“美好生活”、共同体社会制度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作为发展观基础。

^① 早在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就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理念。

用未能进入工业社会忽视印第安人社会发展意义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他们作为地区原住民，虽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后丧失地区发展的主导权，沦为土生白人社会发展进程的补充，但在印第安人权利全面恢复的今天，有关地区发展目的的探讨，包含印第安人的拉美地区需要以人民利益、美好生活、和谐共生等本土理念为基础的发展理念内核。

相较于发达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还面临在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之间的艰难权衡。拉美的历史和现实发展脉络印证了具有地区性历史特点和现代化制度内核的“美好生活”可以成为南方国家的发展共识。“美好生活”是拉美地区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印第安人传统思想就已认为：“美好生活”是他们的生活哲学，智利的马布切人、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克丘亚人等南美印第安人，均有关于不影响其他人、不破坏环境、不损害共同体（社会）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生活”的理念共识。在拉美 200 多年的独立国家发展进程中，“美好生活”以“艾柳”等形式出现，用于国家治理中，并逐步演化为政治理念。21 世纪，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法律和国家战略等形式，探索基于印第安传统理念“美好生活”式的现代化，这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发展强调“生活得更好”而忽视可持续发展思维的修正，更是实践领域对“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实现“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的积极探索。

21 世纪，拉美重新提出“美好生活”印第安理念，代表了安第斯地区印第安思想的振兴，更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对基于南方现实的发展诉求共振。“美好生活”或“生活得美好”，是一种有别于西方发展观的替代性理念，发端于古代安第斯文明却由当代拉美人重新提出。在近年来的学术、政治讨论与实践中，这一理念显现出更多的现代性，其逻辑也更为人们所认同。

长期遭受制度不平等的印第安人，其社会存在无论是按人口比例抑或是文化存续时间都未能得到相应体现，长期处于主流发展观之外。政治领域的“印第安主义”是具有局限性的，流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部分糟粕也需甄别，但随着学术去殖民化的进程，在印第安哲学对发展的思辨逻辑下，或有上述发展困境的解决路径。

二、拉美借鉴传统印第安理念构建新的绿色发展知识体系

开始从理论层面对拉美印第安传统哲学中的绿色发展理念的分析，应首先探讨地区的“知识殖民性问题”，它直接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对拉美地区的发展理念认知。发展离不开理念与知识体系的构建，其构建需要理念来源和知识依据。这一过程不仅基于历史和传统的路径依赖，也受到观念、价值观影响。拉美国家独立 200 年以来，效仿西方社会的主要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因为过度的资源开发导致经济模式单一、地区环境脆弱和多元民族文化构成等地区特性，面临着外部路径水土不服的发展挑战。反思发展危机，方知“探索克服经济学过度西化、简单“科学化”的弊端，重构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张永生，2024）拉美地区的“知识殖民性”在学界对中心国家概念和理论框架存在认识论依赖。在政策和社会发展实践中，还导致社会缺乏对本土印第安理念的共识。

（一）知识殖民主义威胁拉美传统工业化进程向可持续化发展模式的转型

19 世纪末，实证主义在拉美地区的传播，为殖民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持，进一步巩固了科学、技术和资本在国家政策治理中的统治地位。随着拉美国家认识到自身发展由于理论依附性导致的“副作用”与环境脆弱性以来，适于本土的绿色发展观逐渐成为多数拉美国家的地区发展共识，鉴于全球国家发展水平及地区现状差异，探寻符合自身的绿色发展路径需要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应包括横向的交融性和纵向的交互性。从横向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应形成文明互鉴，而非一味地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导。纵向上看，则是如何通过传统文化理念的现代化，解决当代发展危机的理念不足问题。

西方主流价值观对发展的认知强调变化，认为“更如何”才是经济发展的表现。这一理解的内涵源自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讲求生活得更好，享受更高的生活质量，尤其注重财富积累速度，追求个人与部分人的资产数额，却鲜少提及精神生活，将幸福观念等同于物质上的满足感，这一标准是片面的。拉美作为南方国家，曾以跟随发达国家脚步作为发展方向。这形成了现有的片面社会发展的观念，发展质量评价标准，包括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等。

拉美开启的去殖民化进程，不仅是对知识理论体系的反思，更关系着印第安社区发展理念的政策实践。一方面，关乎印第安人作为国家公民的生存权利。去殖民化的目标是解放被压迫的知识，恢复印第安社区的文化和生态实践。例如，玻利维亚的“Pachamama”（大地母亲）理念，不仅是对自然的尊重，更是对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复兴。

另一方面，在生态政治学中，本土化实践日益发展。生态政治学是研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科学，强调通过社会行动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在拉美地区，生态政治学不仅是对环境问题的回应，更是对殖民知识体系的批判。例如，厄瓜多尔的“Sumak Kawsay”（美好生活）理念，将生态保护与社会福祉相结合，推动可持续发展。在政策实践中，本土化实践推动了理念的进步，从生态政治学视角看，印第安理念在厄瓜多尔的政治实践是通过社会行动重新定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过程，更是印第安社区通过传统知识和实践，重新构建人类发展与自然理论关系的案例。又如：墨西哥的印第安理念应用于社区林业管理的政策实践，有效实现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构建基于印第安理念的拉美绿色发展理念

构建绿色发展理念，源自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根本目标在于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理解这一诉求，需要解析其间包含的多重关系，即：人的自身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选择印第安哲学理念，并非因为它古老，关键在于它在阐释上述关系的逻辑基础，契合当前的绿色发展理念。

1. 关于人的自身发展和人与人的发展关系

“美好观念”在发展观念与价值体系中，是印第安人自己对发展道路与财富积累的观念，他们不强调生活得更好，不希望在自身经济发展中挤占他人财富；同时，出于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观念，也不希望以资源为代价谋求发展。印第安哲学有如下具体认知：

其一，人的自身发展是其他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和社会整体发展的基本组成元素。欲实现“美好生活”（“Suma Qamaña”（Javier Medina, 2011）或“Sumak Kawsay”（José María Tortosa, 2009），首先要求个体懂得生活以及共存的内涵。这种意义上的生活有两层含义：一是了解如何获得自身在（与自然相处、在社会集体中）生活中的和谐，尤其强调精神世界的满足；二是懂得如何实现所在共同体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了解人与万物间的关联、共生意义。

其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社会网络、经济发展的前提。印第安人通过共同体理念的构建，为发展提供和谐基础。在共同体中，一些商品、服务和礼品的交换，有时是没有货币、没有市场的，而仅基于相互、对等原则。这种在共同体内的平等互助机制是实现印第安人美好生活的制度认同。基于传统文化共享及相互性思想、集体价值观，印第安传统理念“美好生活”因而具有了应对发展困境的现代性。它从理论角度对“让生活更美好”的物质化发展道路提出质疑。西方基督教哲学与印第安哲学间的博弈更体现了发展观的差异性，但人们对实现“美好生活”的追求则是共同的。

因此，有学者提出，现代人应从中受到的启发是减少或放弃与邻的攀比与竞争。因为“美好生活”中追求的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更是对“共同体”文化的认同，对“我们”共同进步的认同以及与“我们的地球母亲”的共存。在“美好生活”体制中，资本主义应被重新审视或摒弃，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主义所追求的无限发展与地球有限资源间的矛盾造成的。

2.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帕恰妈妈的哲学发展观

印第安哲学中通过美好生活理念的传承，平衡了人与人的关系；通过帕恰妈妈理念，教化了人民的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尊重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构建人与社会和谐的生活，成为印第安各个民族更高的精神追求。

在很多译文与理解中，Pacha-Mama 被解释为“大地母亲”，但实际上帕恰妈妈不仅是“大地母亲”。它来自印卡文化，在克丘亚（Quechua，克丘亚人将其称为“如纳西米语”，Runa Shimi）语中 pacha-mama 意为“自然母亲”。这个由两个单词组成的词汇代表了我们是土地的子孙，信者们相信她是神明的恩赐。mama 一词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是最早且最容易习得的单词，在中文、英文、法文、德文以及克丘亚语中发音相似。在克丘亚语中，mama 是母亲的意思，这一点没有疑义，但在表示我们脚下的土地、种植的田地的意思时，代替 pacha 的却是“Hallp'a”一词。因此在克丘亚语中，为世人所熟悉的“大地母亲”应写为“Hallp'amama”。帕恰妈妈在印第安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赋予了印第安人对自然的感恩与敬爱。神话中，印第安人所尊崇的太阳神通过他的光芒使他的妻子帕恰妈妈孕育了果实，被太阳照耀的大地肥沃富饶，把丰收带给人们。

因此，在南美洲安第斯中部地区，帕恰妈妈成为印第安人的伟大神明。印第安人认为帕恰妈妈，这位自然母亲并非定居在特定地区，而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具有宇宙性。“帕恰妈妈”这一词汇中的 Pacha 有着超越土地的内涵，它具有时间—空间的双重含义。没人能脱离这一时空及这一现实。也就是说，没有人置身于 Pacha 之外。基于如上认识，今天的人们进一步发展了该观念。太阳能带来的热能与光能维持着我们的生活，土地中的果实供我们繁衍。pacha 这一具有时间—空间意义的传统单词实际意味着一种近乎妈妈的角色，为人们带来物质、能量与精神食粮，称之为：Pacha-Mama（宇宙母亲或者说是时空妈妈）（韩晗，2019）。

3. 关于人与社会关系——共同体的发展理念

印第安哲学对当代政治、社会给予了可持续发展路径。在以“美好生活”理念为中心的安第斯群体中，影响深远的共同体组织形式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在印第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社会组织方法，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机制性保障。更关键的是，在这些社会机制中，人们实现着以愉快劳作、生活为方向的“美好生活”社会目标。具体的保障机制表述相异，而逻辑近似：

第一，源自印加语言文化的艾柳。本意指因同一血统或图腾而联合在一起，在合作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经济和社会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词又有了共同占有和耕种的土地的含义，指根据财富共同使用和共同分配的原则，按比例分配土地和劳动的制度，此种制度至今仍流行于秘鲁印第安人中间。

第二，源自艾马拉语的艾尼。它是一种艾柳成员中家庭互助工作体系，工作内容包括农业劳动和住宅建设。是在家庭成员中的劳动互助，当他们需要帮助时，他们以相同的方式提供或请求帮助。最简单地表述为：“今天你做，明天由我来。”^①在工作期间，请求帮助的人或家庭，为前来帮忙的人提供食物和水作为回报。这种工作形式不仅传承于很多农村共同体中，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智利和巴拉圭混血人口社会群体中也存在着。现代社会中，艾尼制度的互助工作内容包括做饭、放牧以及建住宅等。在秘鲁和厄瓜多尔北部的克丘亚语地区，艾尼被称为明卡（minka）或者明加。

第三，在克丘亚人当中，明加（minca, minga）的出现，体现了他们对社会共有方式以及集体体制的一种追求与遵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或者说社会习惯的形成非常有助于共同体的社会集体劳动以及经济建设发展。作为前殖民地时期的共同体或集体自愿劳动传统，明卡实现了对社会力量的合

① 参见：<http://www.historiacultural.com/2009/04/economia-inca-ayni-minka-ayni.html> [2020-10-04]。

理利用，同时带有相互性的特点。在共同体中，人们相互帮助的领域包括：公共建筑物的修建或某个家庭房屋的搭建，帮助他人收获土豆或其他农产品等。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没有任何政府强制力或具体文件规定，实现的基础是共同的社会信念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意愿。它主要存在于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和巴拉圭。此外，在瓜拉尼语中，近似的组织形式被称为“amingúta nendive”^①。

印第安“美好生活”理念，正是对今天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以及探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积极回应。“美好生活”概念第一次公开出现于媒体是在2000年。在报道厄瓜多尔印第安人反抗破坏土地的石油开采运动时提出，在个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建构经济政治框架，基于印第安人的世界观细化此理念。印第安人的先辈将人类看作大地母亲的一分子，而不是土地和资源的主人，认为人类没有权利为了一己私欲毫无节制地挖掘资源。近现代以来，印第安人依然将自然放在第一位，认为与经济发展相比，环境保护更为重要，他们不愿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宁愿发展缓慢些，也不愿无节制地开发、破坏地球生态。

（三）区别于西方认知的本土哲学

对“美好生活”理念的理解，建立在一定的价值观与认知方式基础上。在人类历史上，认知体系的真正发展并不完全基于自身文化的进步，吸收对“他者”知识的理解也是取得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欲求认知的扩展，就不能仅仅关注新理念与既有知识的差异性，而应找出新认知与既有认知的近似之处，同时尊重并接受差异性。所以，对新理念的尊重是知识内涵发展的关键。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往来，若失了彼此的信任，就无从谈起从他人身上获得帮助。认知领域也如此，人们不可能从那些自身拒绝认同的体系中获得裨益。因此，当渐成体系的西方哲学获得广泛认同时，如何理解异于自身的认知，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对此印第安哲学中的“美好生活”理念，认识其与西方认知的近似性与差异性，同时也可探索两种观念对差异认知的态度。

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印第安哲学与基督教西方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观念从理性出发，理论基础为不相矛盾原则（“no-contradicción”）：即不存在同一意义上的真实和虚假两种属性……不相矛盾原则引导出以下两个原则：

1. 认同原则 任何个体必然认同自己（甲即甲），强调与任何不同事物的区别，这个原则与17世纪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Leibniz）所遵从的个人主义原则是一致的，并构成西方代议制民主框架下的法治国家的现代个人中心论的逻辑基石。

2. 否认第三者的排他原则 认为一项主张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不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一原则确立了（“真—伪”）逻辑价值观的相互排除。以上是塑造基于二元逻辑的西方精神的一种主要原则，即一种排他的理性。它只承认逻辑性价值，并选择其一反对其二。这与美洲印第安文明的精神原则呈现显著差异性。

从21世纪发展的角度来看，不断变化的印第安哲学遵从如下三大原则：

其一，对立的互补性原则。在相互形成对立关系的元素间，具有互补作用。“Niels Bohr”从粒子学角度将其理解为“互补性粒子波”（“complementariedad onda-partícula”），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这一概念随后广为流传。这一观点包含两个过程：一方面是对立向同质性发展的过程，这被多米尼克·坦普尔（Dominique Temple）称为表达“统一”（“Palabra de Unión”）；另一方面是向特殊性过渡的发展，是走向相异状态的（非持续性的、特殊的状态），坦普尔称之为“对立”（“Palabra de Oposición”）。

其二，包含第三极的原则。是指在对立的两者关系中存在第三种可能，它恰恰是互补的关系，

^① 参见：Diccionario Guaraní, http://www.portalguarani.com/obras_autores_detalle.php?id_obras=13583。

能阐发出平衡的、具有共存可能性的特殊状态。这种特殊状态，存在于相对立的两极共存环境中，是同时具有非对立及包容性的第三种状态。(Javier Medina, 2011)

从上述理论角度，美洲印第安文化中的相互性理论并非孤立或缺少逻辑的。所有西方与印第安文明的对立，体现在今天二者对不同理想的追求——“发展”与“Suma Qamaña”中。而两者的理论博弈，在托马斯·德阿奇诺(Tomás de Aquino)看来，是由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认为：在同一领域中，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只存在一个真理，其他则为对立物，即谬论。而对信仰“变革”(“Pachakuti”)^①存在的万物有灵论者印第安人，或者持非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人来说，真理恰恰是多元的，在同一个环境中，对同一个问题可能存在近似甚至观点不同的多种“真理”，印第安人会尊重所有出现的“真理”。(Javier Medina, 2011)

3. 相互作用原则 这是一种必然与源于西方文明认知所不相容的观念。因为西方文明本身是单极发展文明，相互关系被理解为具有唯一方向。上帝是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君主，无所不能且无所不知。对他的信仰是他宽容、仁慈的结果，是他自由、恩赐的结果。从本质上看，神是积极存在的；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人们通过劳动、科技开发，而土地是无生命的，被人的主观能动转变为产品和财富。

相反在印第安人理念“Suma Qamaña”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神，存在于举行仪式的时刻，当人们需要其出现的时刻，它就出现。它不仅是存在于仪式中，它还会抽象地出现在宇宙之中。恰如物理学中通过特殊途径看见的物质——量子(“cuántico”)。在印第安哲学中，神的作用无处不在，并在特定仪式中显现。人们因受到无处不在的众神灵庇护，而获得“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所以，尊重万物就是印第安人对自身哲学观念的实践，这对当今深刻的社会、环境危机有着积极意义。在经济领域，印第安哲学对“美好生活”的诠释是，劳作是为了创造生活。

从上述对比中不难发现，印第安哲学与西方基督教哲学间的差异性与对立性。对“美好生活”的理论认识离不开对印第安哲学的理解以及与西方哲学的对比研究。

在比较的基础上，还需探讨知识去殖民化问题。其根本目标是促使人们思考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从希腊哲学到现代科学——是如何通过征服、殖民化和全球化进入原住民的生活世界的，它们入侵了原住民的宇宙观、想象和文化实践；这也是当代印第安政治抵抗运动的理论根源：原住民希望重新将本土传统知识和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制度框架。南方的去殖民化——包括知识的解放，这种知识体现在“南方”领土中扎根的文化身份中——要求解构北方建立的知识，不仅在大学的科学范式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统治国家和人民生活的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中，以释放南方的本土认识论(Sousa Santos, 2008)，开辟新的理解世界的视角，能够引导可持续理念的建设。更是客观分析该理念在现当代的政治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前提。

三、对拉美国家新的绿色现代化发展的政策和实践评析

今天，拉美对“美好生活”宇宙观的分析，具有重要历史作用，它也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知识体系。对于拉美地区乃至整个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借鉴意义，拉美国家尝试通过印第安传统文化，帮助国家、社会构建发展政策及其实践的指导。这一过程并非渐进式的，而是以制约和发展交互的模式展开。

^① 帕查库蒂也被称为(Pachacuti Inca Yupanqui或Pachacutec)，是印加帝国的第9位统治者，在位时间：1438—1471年。他的名字被解释为“世界倒转者”或“地球震动者”，对印加文明乃至世界历史影响深远，统治期以“变革”闻名。在他的领导下，印加帝国从库斯科的小城邦发展成为地跨西南美洲重要地区的广阔帝国。他的征服范围北至现代厄瓜多尔的基多，南至靠近的提提卡科湖地区，包括现在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他在15世纪的统治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他实施了创新的策略，塑造了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实现了印加文化的崛起。印加帝国成为强大且影响广泛的文明。——作者注

（一）拉美国家在构建绿色、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积极作用

1. 拉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制度实践

在构建可持续发展新路径的进程中，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国开展了“美好生活”政策实践，成效显著。如：玻利维亚“美好生活”（艾马拉语：Suma Qamaña 或西班牙语：vivir bien）理念实践始于2006年“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党候选人埃沃·莫拉莱斯当选总统，政府以“美好生活”为指导，推动了一系列政策实践，旨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边缘群体的全面赋权。该政策实践基于安第斯地区印第安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公平以及多元文化共存。2009年，玻利维亚通过新宪法，美好生活纳入国家基本法。《宪法》第306条提出，国家的经济模式旨在“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美好生活”。

玻利维亚“美好生活”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成效，并获得国际机构的认可。首先，在莫拉莱斯执政期间国家实现了年均5%的GDP增长，2013年、2014年经济增长位列拉美第二，人均年均GDP从1994—2005年的961美元，增加到2006—2017年的2392美元，远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其次，社会不平等问题显著改善。贫困率下降，极端贫困率从2006年的38%降至2017年的18%，基尼系数也从0.567降至0.44。（徐世澄，2018）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获得了国际机构的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曾积极评价玻利维亚“美好生活”国家规划对经济发展政策和实践的贡献：发展不仅需要工业化指标，而且应将社会福利等其他要素纳入世界人民发展的新指标中。机构的新指标建设也考虑接受其作为多维社会福祉的标准之一。

厄瓜多尔进行了类似的制度性实践，传统理念及环境权作为法律主体纳入国家基本法。2008年通过宪法明确：“保障人民的美好生活和可持续发展。”“充分尊重自然存在权利，尊重自然生命的周期：结构、功能和进化过程的保护和再生的权利。”厄执政党主权祖国联盟把“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写入新通过的党章，政府还制定了《2009—2013年美好生活计划》和《2013—2017年美好生活计划》，为保障计划实施，于2013年进一步成立“美好生活秘书处”，完善机制保障。

拉美的政策实践是与西方理论的对话，重要的启示在于：第一，并重生态理性与文化多样性。生态理性强调从生态和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第二，拉美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为构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例如，拉美部分国家在印第安社区开展传统农业现代化实践，依传统农历轮作和间作，不仅保护了土壤和水资源，还维持了社区的生计。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社区农业发展的进程，还因符合印第安民众的文化价值，政策具有广泛社会认同，所以收效较好。第三，展开平等的跨文化知识对话，应根据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合理开展原住民与社会其他人口、国家内与外部社会的交流，前提是剥离偏见。

2. 构建了包含印第安理念的绿色发展思维

通过对印第安传统理念的现代价值观分析可知，本土既有的发展理念具有可持续、绿色发展、和谐社会等内涵，为当代拉美社会提供了可持续理念支持。印第安“美好生活”等理念，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的一种转变，认为人类的美好生活只有在维护好大自然秩序的基础上才可以实现，人类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因此，“美好生活”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心声。但它又强调一种“相互性”，摒弃“附属性”，认为人类、社会、自然相互依存，谁也不附属于谁。正如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所言，“大地母亲可以没有人类而生存，可人类不能没有大地母亲而生活”。可见，印第安人“美好生活”的理念从先古流传至今，从原始生态的生存哲学到现今经济发展的环境维护，建立了本土发展观内核。

“美好生活”政策实践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影响力。玻利维亚外交部发布的1995—2010年《生活得美好》文件指出：美好生活不等同于生活得更好，包含印第安原著民族在内的所有公民对世界各国宣言：拯救地球母亲和人类，重建美好生活战略，拯救地球、人类和生活的十诫（2008年莫拉莱斯在联合国原住民问题常设论坛的发言节选）。大地不属于我们，我们属于大地（2009年

在联合国宣布 4 月 22 日为地球母亲日的讲话), 各国人民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提案和会议有选择生存文化或死亡文化的权利, 我们选择将美好生活作为国家规划建设的首要基础, 我们致力于实现它。^① 实践还涵盖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 通过颁布《大地母亲权利法》, 赋予自然以法定权利, 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平衡。

3. 进行了包含印第安理念的绿色发展的制度实践

有学者认为: 近几十年拉丁美洲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新进程, 在某种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刺激的负面效应: 贫困率上升、社会排斥、社会不平等、失业、工作条件的恶化以及自然领域的水土流失等。很多国家选择了其它的社会经济理念(共同体的、民众的和倡导团结的经济)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关于拉美国家社会经济道路的选择, 学界有着不同认识: 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改革, 另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优化再分配的改革。今天, 西方政治思想已不再是拉美追寻的唯一道路, 本土化进程加之印第安影响力的提升带来了安第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新政治实践。

在印第安文化的认知中, 人们生活的环境以自然为基础, 同时包括超自然的宇宙。被奉为神灵的一系列超越自然的实体, 分管一个领域的职能并居住在特别的地方, 养护万物生灵。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是稳固的。这一世界逻辑体系被看作生活的全部。它也是一种受到神圣原则指引的道德价值体系。

基于此, 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两国曾开展了绿色可持续制度实践。两国在上一轮左翼执政周期中, 因其发展模式选择, 在历史上首次成为走入“公众讨论”视野的国家。其加入了“美好生活”安第斯理念的新宪法(2007 年玻利维亚及 2008 年厄瓜多尔宪法)作为对西方发展理论的反対, 不仅仅停留在对既有发展模式的批判与诟病, 而是提出了替代性发展道路。“美好生活”作为新的政治理念、社会治理方法和经济原则渐入人们的视野。两国的经济形式为“多元化共同体经济”(“Economía Plural y Comunitaria”)和“社会化团结经济”(“Economía social y solidaria”或“团结的人民经济”“Economía popular y solidaria”)。(José Luis Coraggio) 经济模式的转变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美好生活”的政治实践并非在今天突然诞生的, 在安第斯山区的前哥伦布时期, 乃至殖民时期, 以及近代国家成立后的历史上, 地区发展进程中都有印第安“美好生活”理念的存在及与其相关的制度实践。

(二) 拉美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可持续发展制度实践中面临的共同挑战

任何理念的提出, 从制度和理性角度来说都是一种对完美理论体系的追寻或无限接近。但在人类现有历史中, 各种理论体系的实践由于历史、外部、内部原因, 并不能达到理论完美。

1. 拉美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制度实践面临的质疑

同北美国家相比, 拉丁美洲的制度发展与实践轨迹被学者定义为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 认为拉美在现代化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对于这种制度领域的相对落后性, 很多学者将其归咎为拉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与印第安传统文化间具有过多的冲突性。这种观点正在经历着变化, 20 世纪末以来, 关于民族国家发展、少数人权益的保护与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分析与讨论日益热烈, 其焦点之一就是“美好生活”理念的政治实践。

在这一讨论中有两点值得人们注意: 印第安文化思想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进步; 对印第安理念的认识也不应仅限于哲学、思想领域。早在几十年以前, 秘鲁社会主义学者马里亚特吉就曾明确了这一观点:

“长期以来, 一帮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大庄园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律师和文人, 终将土著人问题神秘化。现在已不允许再把这个问题神秘化了。土著种族精神上 and 物质上的贫苦,

^① https://www.planificacion.gob.bo/uploads/Vivir_bien.pdf.

最清楚不过纯粹是几个世纪来压在他们身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造成的。这种继承了殖民地封建性的制度就是酋长统治制（gamonalismo）。在这个制度统治下根本就谈不上印第安人真正得救”。

土著居民恢复权利的要求，只要停留在哲学或文化范围，就不会有历史性的结果。而要取得这种结果，使之成为现实和有形的东西，这种要求必须成为恢复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要求。（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987）

“美好生活”在拉美的制度实践，因政党更迭、左右翼政府“钟摆效应”、经济发展受到外部冲击、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因素以及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历史冲突与文化隔阂，而呈现与理念相背离的“怪象”。在执政后期，印第安裔总统莫拉莱斯政府受到印第安人游行抗议，厄瓜多尔提出“美好生活”理念的总统得不到印第安群众的认同，秘鲁印第安裔总统卡斯蒂略深陷政治危机，匆匆下台。这不禁让人思考其根源。

2. “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本土可持续发展制度实践的困境

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一样，历史因素带来了实践的困境。纵观拉美发展历程，如下三方面因素制约了拉美的可持续发展政策有效性。第一，历史发展中的依附性。长期以来“依附论”被视为拉美发展症结的“最优”解释，这一理论也曾获得本地区学者的认可，拉美在制度发展进程中，也长期存在对西方制度的“依附性”。因历史与不同部门对外部的依附性，拉美呈现了第二个特征：发展部门的不均衡性。这直接导致了地区错过了诸多均衡发展的“窗口期”。缺乏现代化铁路网、必要的基础设施、对外部门的“过度优越”等，导致了国家的发展难以根据国内的需求来发展。也就是说，外部利益左右着国家发展进程。第三，内生性动力不足。理念的提出需要丰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追随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耗尽了自然资源积累的国家财富，缺乏物质储备的多民族国家行为体，难以在面对西方资本势力时，维护自身的发展利益。

上述问题在南方国家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处于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外部依赖性较高的单一南方国家难以独立自主地选择具有本国特色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方面，西方资本制造了不利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国内决策受到西方利益集团的多种途径牵制，难以让拉美政府跨越几个世纪的忽视与偏见，西方舆论主导下的国际社会，也不利于本土发展观的认识与推广。

四、中国与拉美在全球南方框架下开展绿色可持续发展经验合作的潜力及展望

绿色发展理念并非关乎一人、一国，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共之实践。“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关切是发展，中国的发展应然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之成功案例。中国的发展并非局限于本国内部，更带动着拉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进步。拉美国家在不断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经验更具发展中国家间共性、是从南方国家视角出发的本土化发展的成功范例。今天南方国家所遇到的发展问题，很多都源于西方影响下对发展内质的异化。因此，中拉间存在着对界定“发展”概念的更多潜在合作共识。理念的共识或为今后中拉文明互鉴之重要内涵。

追溯各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发展的实践意义更为重要。当前，拉美绿色发展政策的可行性面临的重大威胁，不仅在于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兼容性，更在于拉美国家缺乏足够的发展。这也是拉美通过对安第斯“美好生活”无限接近式地探索面临困境的关键所在。部分拉美学者已对中国消除贫困政策有了更新的认识，中国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强劲内生性发展。这或许能为拉美当前的本土理念实践的未来方向，提供启示。

同处“全球南方”国家都承认与全球现代化进程存在着辩证关系，通过完善本国的发展观，才

能真正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已步入发达行列的欧美国家，通过去工业化和转嫁碳排放危机给其他国家等方法快速实现了绿色、可持续。甚至，对发展中国家横加“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指责。发展中国家既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又需要在不利的国际话语体系下构建符合自身的发展观，其道路可谓艰难。一方面，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国家经济持续进步。如拉美之案例，还面临着知识殖民主义等诸多不利，发展中国家间，因而有着更为近似的挑战与经验交换的必要性。

在未来，拉美或将在充分学习中国内生性发展战略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本土理念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国的经验表明：“让更多的人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在于自身发展，而只有通过中拉文明互鉴，才能不断增进南方国家和政党对有益的他国经验的了解和认同，进而形成南方国家间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共识。

参考文献

- 阿玛蒂亚·森 (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28—35 页。
-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 (1987):《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白凤森译。
- 马丁等著 (2007):《拉丁美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第 47—59 页。
- 韩晗 (2019):《略述“美好生活”印第安理念在拉美的制度实践与挑战——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为例》,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40—48 页。
- 索飒 (2009):《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第 67 页。
- 曾昭耀 (2002):《拉美发展问题论纲——拉美民族 200 年崛起失败原因之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第 232 页。
- 张永生 (2024):《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继续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和绿色增长叙事》,载《经济研究》2024 年第 1 期。
- de Broglie, L. (1924). *Recherches sur la théorie des quanta* [Research on the quantum theory]. *Annales de Physique*, 10 (3), 22 – 128.
- Javier Medina (2011): “Acerca del Suma Qamaña”, ¿*Vivir bien: Para digma no capitalista?*, Plural editores, Bolivia, pp. 39 – 63.
- José Luis Coraggio: “La economía popular solidaria en el Ecuador” http://www.coraggioeconomia.org/jlc/archivos%20para%20descargar/La_economia_popular_solidaria_en_el_Ecuador.pdf [2019 – 09 – 29].
- José María Tortosa (2009): “Sumak Kawsay, Suma Qamaña, Buen Vivir”, Universidad de Alicante, www.fundacioncarolina.es/es-ES/.../NPTortosa0908.pdf [2019 – 09 – 29].
- Serge Latouche (2010), *Farewell to Growth*, Polity Press.
- “Economía Inca Ayni Minka Ayni”: <http://www.historiacultural.com/2009/04/economia-inca-ayni-minka-ayni.html> [2020 – 10 – 04].
- Sousa Santos, B. de. (2008). *Another knowledge is possible: Beyond northern epistemologies*. London: Verso.
- Temple, D. (2011). *Teoría de la reciprocidad* [Theory of reciprocity]. La Paz: Plural Editores.
- Diccionario Guaraní: http://www.portalguarani.com/obras_detalle.php?id_obras=13583<http://www.ecoportal.net/content/view/full/88495> [2019 – 03 – 05].

Exploring Green and Sustainable Modernization in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HAN H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ic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0007

Abstrac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re confronting a common challenge faced by the Global South: constructing a development path that aligns with their own realities. This challenge encompasses multidimensional issues in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Although Latin America embraced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latively early, its practical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differs from tha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compatibility” of external ideas and practical paths has prompted Latin America to reconsider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igenous concepts. Unlike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reflective path of post-industrial era ideas trigger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Latin America has seen the rise of indigenous concepts such as “Buen Vivir” (Good Living), “Pachamama” (Mother Earth), and community-based ideas of indigenous peoples, which have gained momentum alongside the wave of anti-intellectual colonialism. These have enriched the spiritual core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se indigenous concepts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breaking down the theoretical biases of colonial centralism and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loc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in policy, providing new directions fo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o explore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aths. However, the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in Latin America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China’s successful experience may become a new opportunity and highlight for the development concepts, practic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reen and Sustainable; Modernization; Global South; Indigenous Traditional Concepts; “Good Life (Buen Vivir, Vivir bien)”

责任编辑：刘心如

证书编号: 548970C23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收录证书

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生态文明研究(原: 城市与环境研究)》入选为CSSCI（2023-2024）来源期刊，特发此证，以资证明！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2023年6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生态文明研究（原《城市与环境研究》）：
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23年度
经济学最受欢迎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2024年5月



证书

《城市与环境研究》被评定为
“2022 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
核心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
2023 年 3 月